

张謇对上海的贡献

□朱江

张謇不仅借力上海,也参与了上海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张謇在实业界、教育界的声望,为其他企业和团体所看重。张謇在上海积极组织立宪公会的活动,参与东南互保和南北议和,也凸显了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同时,上海还是张謇宣传南通成就的舆论场。

为新任会长。

张謇与上海的教育界关系密切。1905年,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成立,张謇长期担任会长。江苏省教育会“以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图学界之进步为宗旨”。江苏省教育会作为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在推动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地区的新式教育的发展上,弥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不足,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张謇的名字还与上海的不少学校联系在一起,如复旦公学、震旦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中国公学等。张謇对于复旦公学和震旦学院的支持很有代表性。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年,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震旦陷于停顿。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人应马相伯之邀,担任复旦的校董。张謇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因此一方面应耶稣会之请,担任震旦学院的董事,3月22日张謇日记记载:“徐汇故震旦学院请为董事,复支其学事,许之”。张謇与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8月正式复课。另一方面为复旦的开办奔走,3月29日张謇“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而且认为复旦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

张謇在上海积极组织立宪公会的活动,参与东南互保和南北议和。在帝制崩溃、民国肇始之际,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给予经济上的帮助。1911年12月下旬,为筹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黄兴向三井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具保证书作信用担保。张謇的保证书写道:“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黄兴三井借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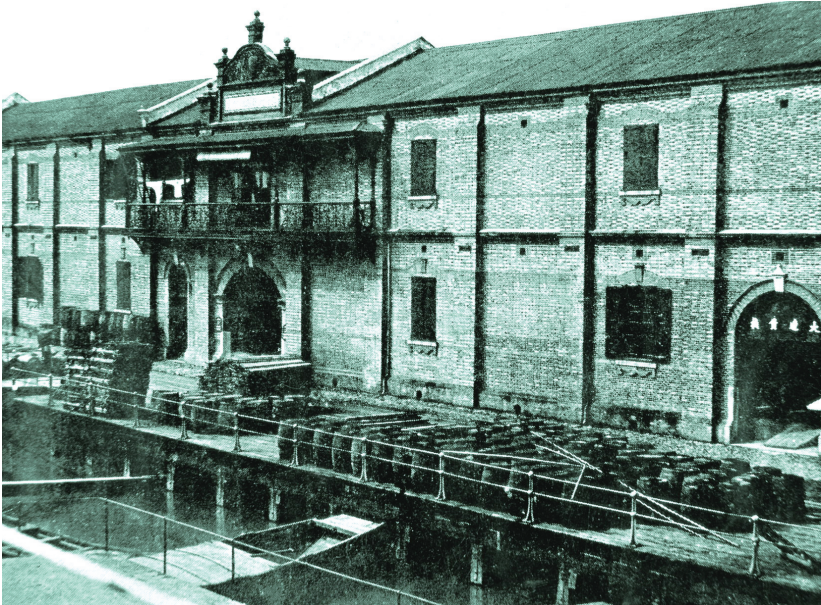
当了俘虏。

这次夜袭,因事先进行了多次侦察,摸熟了地形,掌握了详细敌情,同时得到了崇明地下党的密切配合,所以未伤一兵一卒就攻下了新河镇据点。紧接着又夺取了新河镇的伪军粮仓,共缴获了步枪100多支,子弹数十箱,更重要的是夺得了粮食700多担,解决了我军后勤供应的燃眉之急。这次赴崇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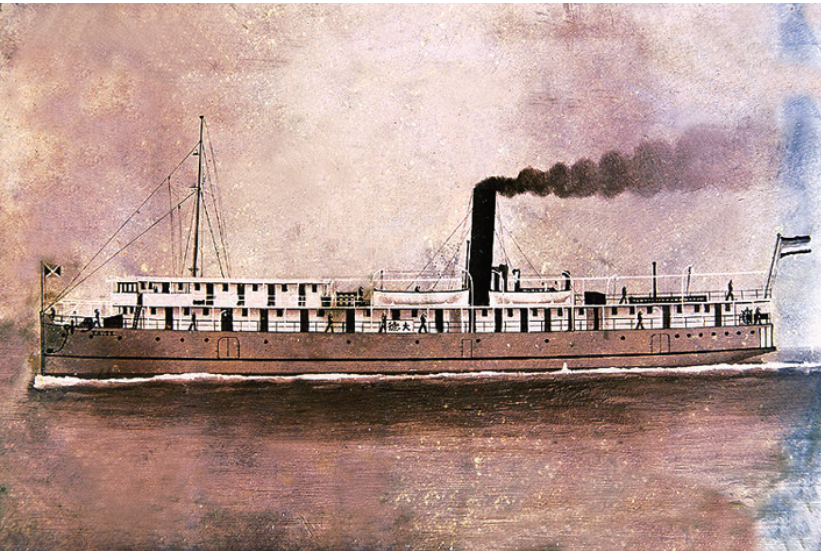
二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南警卫团决定乘着新河镇战役的胜利,夺取由国民党控制的崇明县城。并任命了东南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沈坚如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再说海启江防大队在新河镇战役后,群众参军踊跃,队伍迅速扩大,后改名为崇明县大队,仍由郁谦任政委、龚兆林任大队长。8月26日下午沈坚如召开了攻城军事会议,决定先解决驻守在崇明城外学宫据点内的敌人,然后夺取县政府。当时敌人守城的布防为:“苏海”大队180余人,驻守在朝阳门两侧及南门、西门和北门地段;“崇抗”一大队一中队150余人驻守在东门及学宫内,二大队120余人驻守在万安仓南北一线。根据敌人的兵力布防,布置了我军的战斗方案:东南警卫团三个连设伏于东操场一带,佯攻县城,同时打击城内出城援助的援敌;县大队主攻城外的敌人据点(学宫),同时派出部分人员设伏于学宫正面的南堤河下,打击溃退的敌人。8月30日午夜我军从长兴驻地出发直插县城。深夜12点县大队向学宫据点内的守敌发起总攻,这时进行佯攻的我东南警卫团战



大达轮步公司的大达货栈



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德号轮船

是张謇对于共和的实际支持。

上海是张謇宣传南通成就的舆论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对于张謇及其引领下的南通有很多的关注。《密勒氏评论报》《北华捷报》《大陆报》等外文报刊也有不少报道。1926年8月28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敬爱的张謇去世》,告诉读者:“张謇,前任农商总长,江苏省南通的实业领袖,中国最为杰出人物之一,因连

续数月的流感所致,于8月24日周二中午病逝于家中。”考虑到《密勒氏评论报》作为周刊的出版周期,这是不算晚的报道。报道还配有张謇着西装的照片,并简要回顾了张謇的政绩,指出:“他近年来最为卓著的事业,是对于所谓南通模范城市建设的推进,这是与南通老城区比邻的区域。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而导致经济萧条,南通已经在海内外广为人知。”(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东南雄鹰四战崇明

□李元冲

三

东南警卫团二下崇明后一个月,苏中四分区党委认为有必要拿下崇明这块国民党势力十分猖狂的地方。于是苏中四分区党委增派南通警卫团与东南警卫团共同作战,拿下崇明县城。再说二战崇明的我攻城部队撤出县城后,国民党崇明县长孙云达不仅重新占领了学宫,而且又在城外增设了桥镇据点。为防止东南警卫团再次攻城,孙云达又请求国民党上级部门增加了张九龄大队的3个连守城,这样敌方的总兵力增至1000多人(含孙云达的守城部队、孙信民的增援部队和张九龄大队)。孙云达又在岛内搞起了白色恐怖,“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土豪劣绅又乘机反攻倒算。为此苏中四分区决定再次教训孙云达一下。

1945年9月中旬东南警卫团和南通警卫团各出主力部队在苏中四分区专员梁灵光、地委副书记洪泽率领下,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分乘30多条帆船再次赴崇作战,指挥所设在南盘液镇(今港西乡政府驻地)的北双小学内。9月17日晚部队包围了县城,冒雨发起进攻。孙信民部依靠精良的美式武器,凭借坚固的城墙,居高临下从城上向我军阵地打击。而我方由于缺乏攻城的重武器,激战一

日两夜,攻城未克。时值国共和谈之际,崇明又非全局的战略要地,为顾全大局保存实力,于9月19日主动撤出攻城部队(包括崇明县大队),根据上级命令,再次撤至江北。此后,崇明县大队部分战士编入了东南警卫团,部分战士回崇明开展反“清剿”斗争和锄奸斗争等秘密工作。

四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一举解放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这振奋人心的消息给一江之北的东南警卫团和驻在海门倪家镇的崇明县工委以极大的鼓舞,东南县委和崇明县工委立即组建了崇明县政治保卫大队,为接管崇明作准备。县大队政委仍为郁谦,大队长由吴思义(时任东南警卫团教导队长)担任。并从东南警卫团抽调来一批干部和战士充实县大队(1950年县大队改名崇明县警卫团)。

1949年5月30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5军的一个团从崇明海桥港登陆,向县城进发,与此同时崇明县大队也从海门灵甸港出发,在小竖河登陆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攻崇明县城。部队首先拿下了县城外圈的桥镇据点,守卫桥镇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大队,被我军强大的攻势迅速歼灭,溃退的桥镇守敌全部撤到了城内顽抗。县城的守敌是国民党江苏水警团。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向水警团劝降未果,于6月1日上午9时集中火力攻城。下午3时攻城部队向水警团团长全裕谦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午夜12点前投降。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全裕谦于午夜11时向攻城部队投降。2日清晨6时,人民解放军接管县城。上午8时水警团在东门外大校场缴械投降。崇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史海回眸

朱自清听韩国钧讲话

□程太和

散文家朱自清与韩国钧没有多少交集,但朱自清对韩国钧是极为钦佩的,这可从朱自清的散文《旅行杂记》中看出。

1924年7月3—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人之一的陶行知参加了本届年会,他记录了此次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内中有男的,有女的,连蒙古人都来赴会,真是一个空前的大会”(《空前之全国教育大会》,载1924年7月19日《申报》)。

当时,朱自清在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任教,作为旁听员(列席人员),他从温州经上海,坐火车赴南京东南大学参加此次年会。

作为东道主的江苏对本届年会极为重视,督军齐燮元、省长韩国钧、督办高恩洪三位大员都亲临开幕大典。开幕典礼上,齐燮元扯开喉咙、甩腔拖调一字一板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上做拆字戏法,先讲“教育”,继说“教育改进”,再谈“中华教育改进”,最后则在“社”字上大做文章,层层递进,一派胡言,纯粹就是个“半篇八股”。

而对于韩国钧的讲话,朱自清则极为钦佩。他在《旅行杂记》中记录了韩国钧的讲话。韩国钧在讲话中说:“现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统一的。今天到会诸君,却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为职志,毫无畛域之见。可见统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韩国钧的话讲到了点子上,表明了他对军阀混战,人民遭受涂炭,国无宁日的强烈不满。这一“警句”不独吸引了朱自清的注意,更赢得在场诸君的认同与欢迎,“这最后一句话确是漂亮,赢得如雷的掌声……”

《旅行杂记》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刊》第130期上。令人遗憾的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后不到两个月,江浙间就爆发了“齐卢之战”,江浙两省成了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上海郊外的西、北两面,成了两军激烈争夺的主战线,备受蹂躏。尽管韩国钧竭尽全力冀望消除兵祸也无助于事。

南通的军统组织

□王士明

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最大的特务组织之一。1938年成立,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在各地广泛设立特工组织,并渗透到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和交通运输等部门。

军统在南通的活动较早,1934年以力行社成员顾思明为大通通讯社社长,1938年改用《苏民日报》社的名义,在南通进行特务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成立军统南通调查组,顾思明、唐绍曾为正副组长。同年10月,唐绍曾以军事委员会鲁苏皖党政军工作总队第八大队南通工作队队长名义通告开始工作,并利用大通通讯社作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1946年7月,军统局改组,公开武装特务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南通的下属机构则时分时合,活动诡秘。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内的第二处处长蒋剑民,兼任保密局苏北站站长,不久,苏北站改称苏北特种站,陈軼珍任站长,下属南通组组长相继为齐治国、文钊,又以前进指挥所参谋处二科上校参谋名义进行特务活动。与此同时,以钱峰、冯燕宾(又名冯有兴)为正、副组长,唐绍曾为情报主任的保密局直属苏北军事联络组,亦在南通进行特务活动,1948年冬改组为苏北行动队,钱峰为队长,杨冒岳为副队长。南通军统的下属组织,派驻在南通城区和各县主要城镇的有城防指挥部军警联合稽查处、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直属组、南通守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及各县的情报科、组和谍报队、组、站等,名称多达40余种。南通军统组织,以公开与秘密结合的方法,搜集共产党党政军情报和各民主人士情况,捕杀残害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查截商民的财物。

1946年,南通军统组织伙同国民政府军队第一零五师谍报连,于3月23日—4月5日,先后逮捕并残酷杀害了参加三·一八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孙平天、季天择、戴西青、钱素凡、罗镇和8人,并将遗体抛入长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南通解放前夕,钱峰、顾思明、唐绍曾等头目率残部撤退逃江,组织终被瓦解。

如皋中山钟楼石碑

□苇航

近期,如皋重修中山钟楼。旧楼下方原有一块石碑《如皋中山钟楼》,后不知所踪。1995年版《如皋县志》录其碑文:

如皋地滨江海,凤称富庶之区……于是中山钟楼之创建,以树时计之标准,使四境之内各有所警,一洗因循怠慢之积习,而同趋于鼓舞作新之正轨。总理有言:人民平等,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斯役营缮之费,建设、教育两局分之……

碑文写于1931年6月,撰文者为时任如皋县县长钱佐伊。有多位老人问过我:中山钟楼是否属于“辛亥革命印迹”?他们认为不是:1931年距1911年辛亥年,已有整整20年。从名字到碑文来看,皋人修建中山钟楼主要目的是纪念孙中山,继承他的遗训,鼓励大众珍惜时光。有趣的是,教育局参与建设,再次证明修楼是要教育民众,应当无关辛亥革命。

此楼和孙中山的确关系密切。碑文下方还刻有“邑人沈卓吾书,倪景山刊石”,倪景山是如皋刊石高手。沈卓吾是孙先生的秘书。他很爱国,书法也不错。广州利工民织造厂,精心开放织造技术,造福国民,沈卓吾欣然题字:利民裕国。《国货指南》面世,沈先生也有题字:中国人用中国货乃是同胞爱国第一件大事。沈卓吾的墨宝,倪景山的石刻,相得益彰,《如皋中山钟楼》当是一块上佳的碑石。近来听闻王姓古董商人入藏此碑多载。倘若他能捐献此碑,立于新楼附近,必是盛事一桩,佳话一段,流传于如皋历史的长河中。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